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G257.34
2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

苗怀明 著

中华书局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

苗怀明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 / 苗怀明著.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4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101 - 06619 - 7

I. 二… II. 苗… III. 小说—文献学—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G25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1054 号

书 名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

著 者 苗怀明

丛 书 名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责任编辑 罗华彤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4 插页 2 字数 38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6619 - 7

定 价 60.00 元

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

总 序

程章灿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古典文献对中国文化传承的贡献是全方位的。它不仅以一种相对集中而凝固的方式保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而且通过传抄、印刷、编辑、整理、诵读、研究等传播方式,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而参预了对中国人的心理情感和思想文化内涵的塑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在文献传承的过程中,不仅各个学科领域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具体文献的传承,参预了对中国文化之民族特色的塑造,并影响了中国人对自身心理情感与思想文化的民族认同;而且,作为文献著录和书籍传承的重要支撑的目录学,也一贯致力于整合林林总总的固有文献与已有知识,使之系统化与合理化,与此同时,其自身还构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框架。有鉴于此,几年前,当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的南京大学中文系)正式实施国家“985 工程”“汉语言文学与民族认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研究计划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古典文献研究所的同人们集思广益,提出以“文献传承与民族文化认同研究”为名设立子课题,并很快通过了专家组的立项论证。现在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套“文献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丛书”,就是这一子课题的研究成果。

显然,在设计这个子课题时,我们主要着眼于其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宏观思路的拓展,力图从大处着眼,以开拓我们的思维。但是,在这项研究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深切地感到,只有针对具体的对象和确定的问题展开学术研究,运用多年的学术积累,发挥自身的学术优势,才能真正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进展,不管这些进展是理论方法的创新,还是文献史料的丰富,或是对具体问题研讨的深入。因此,我们决定从专题研究入手,对各项历史文献展开整理、解读和阐释,不避小题,以避免不切实际的蹈空议论。也可以说,我们的宗旨就是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我们相信,对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献进行的整理与研究,可以构筑坚实的工作基

础,搭建良好的阐释平台,进而深入探究中华民族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方面基于心理情感以及思想文化基础之上的民族文化认同;同时,研究作为文献传承的知识支撑系统的目录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也有助于追踪中国文献、知识以及学术思想框架形成的过程及其特殊性。另一方面,我们既注重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的传世文献、儒家正统文献以及域内文献的传承研究,又重视对出土文献、非儒家文献以及域外文献的传承研究。关注这些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文献,当然意味着文献视野的进一步开阔,但更重要的是,从新的文献视野中,也有可能发展出观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新眼光。

具体说来,这套丛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以目录学及其历史发展为核心,探讨富有中国特色的文献、知识以及学术文化框架渐次形成的过程及其特质,最终叩问中华民族文化之特质。清代史家章学诚在其名著《校雠通义·自叙》中早就说过,“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近代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发微》中更明确指出:“目录者,学术之史也。”徐有富长期致力于目录学研究,其《目录学与学术史》一书,择取《汉书·艺文志》、《七录》、《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元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书目答问》等目录学名著,从文献聚散、类别分离、序跋评说等方面入手,辨析古代学术各门类的兴衰分合,从中窥见中国学术思想的起伏变迁与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体系中,经学无疑占有首要地位,相关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经学目录在目录学中也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长达三百卷的朱彝尊《经义考》是清初最重要的经学目录著作。它从目录学角度,对清初以前的经学著述之目及其分类、存亡、阙佚等情况详加考述,“源委详明,足称博瞻”,可称是一部集大成的经学目录。另一方面,作为朱彝尊“穷一生之力”完成的私家著作,《经义考》所建立的经学目录的新体系,在经学学术史上亦自具承先启后的意义。张宗友《〈经义考〉研究》一书,从文献著录与学术承传的角度对这一部专书条分缕析,论列甚详。

第二,以书院研究为中心,探讨书院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制对文化传承的作用。正如《书院与文化遗产》一书编者所强调的,“对书院史研究的重视,并不是在单纯保存文化记忆,而是在教育体制发展的背景下,在传统中寻找可供转化的精神资源”。这是众多书院研究者共同的人文关怀,也是编选这本论文集的特别动机之一。从官学与私学的关系来

说,书院显然属于私学。在一定意义上,研究书院与研究私家书目颇为类似。研究私家书目,就是探讨中国传统目录学形成过程中有别并且独立于正统官修目录之外的另一个目录传统;研究私家书目与官修目录如何互动,就是探讨民间学术如何与官方学术相互影响,以及不同知识学术体系如何融合组成传统知识文化体系,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知识文化系统的构建等问题。在这套丛书中,《书院与文化传承》有些与众不同。作为一部论文集,它既荟萃了包括胡适、聂崇岐、邓之诚、瞿宣颖等前辈学者在内的重要论文,又选录了近年学者的研究心得;而它的编者卞孝萱和徐雁平也同样属于两代学者——它从两个方面象征了学术文化的薪火传承。

第三,从那些通常不太为人重视的文献入手,挖掘一些曾经受到忽略甚至被长期埋没的学术问题,探究这些文献中新的学术文化蕴涵。石刻文献、笔记小说文献、域外汉籍文献,都是以往研究中不大为人重视的。虽然从宋代以来,金石学便已成为一种专门之学,但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世风和学风的转变,关注石刻文献的人越来越少,特别是对那些传世石刻文献,很多人似乎把它们遗忘了。实际上,不仅二十世纪新出土的石刻值得研究者注意,传世石刻中也仍然有许多意义空间有待开掘,有许多学术问题有待探索。《古刻新诠》是作者近十多年来所撰石学研究论文的结集。书名中所谓“古刻”,既包括传世石刻,也包括新出土的石刻。书名中标明“新诠”,意在强调这两类石刻都有重新诠释的必要和前景,这也正是文化传承的题中应有之义。书中考释涉及文学、语言、史学、艺术等领域,说明这种诠释正不必划地自限。严杰《唐五代笔记考论》实际上也可以改题“古稗新探”。作者潜心研治唐五代笔记小说二十余年,对笔记小说的概念、范围、唐五代笔记传承情况及其文化价值都有独到见解,对与此相关的正史与笔记、事实与虚构、当世记录与后代修饰等重要问题亦有深切理解。本书分上、中、下三编,包括总论、述要与具体考述三个部分,面、线、点相结合,考论相兼,无论是全局描述,还是微观考证,对于唐五代小说、历史及文化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要深入理解文献的意义,不仅需要了解文献自身的形成及其传承过程,也需要参考和借鉴前人的研究积累。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小说研究基本上不登大雅之堂,二十世纪以降,小说研究才“升格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特色与个性之所在”。这一份丰厚的学术遗产应该及时清理,其中的利弊得失亦有待总结。苗怀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学述略》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研究分为四个时期:二十世纪上半期、建国后三十年、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从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等方面,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成果作了全面盘点,尤其突出有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名著的文献。小说的产生、存在、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诗文辞赋等文学样式有很大差异,小说研究也相应地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苗著从学术史角度所作的文献清理,显然有助于这两方面的正本清源。

对域外汉籍文献的重视,是本丛书的一个特色。《古刻新诠》中有长文考释《大越国李家第四帝崇善延龄塔碑》。巩本栋《宋集传播考论》也十分重视域外所存的宋代文学史料,并以相当可观的篇幅论述宋集撰述流传高丽、朝鲜两朝的情况。金程宇《稀见唐宋文献丛考》更是致力于发掘日本、韩国所藏唐宋文献,并利用域外访获的资料对中国固有文献进行订补,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有《帝王略论》、《李元宾文集》、《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等多种。另一方面,作者还从出土文物以及法帖、墨迹等传世文物中,发掘并整理出一批珍贵的唐宋文献。如果说文物是以另一种物质形态出现的文献,那么,域外汉籍则是在另一种文化环境生存的文献。如果说文物指向的是物质文化与典籍文化的复杂联系,那么,汉籍在域外的承传,则往往是中国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密切关系的见证。

第四,对宋代文献的研究是本丛书的重点之一。这不是偶然的。在中国文献传承史上,宋代是由抄本时代真正进入刻本时代的转折点。无疑,刻本时代的到来对文献传承和文化繁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宋集的刊刻和流传,无论就其外部条件还是就其质量及数量而言,都远胜前代。《宋集传播考论》从宋集的编辑、刊刻、流传以及明清人对宋集的整理等方面,对宋集的传播作了全面论述。宋代文学是宋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宋集是宋代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说,宋集的传播也就是宋文化的传播。在宋集之中,诗选颇为引人注目。宋人尤其是南宋人好讲学,好议论,也好选诗、评诗,加上刚迎来刻本时代,南宋诗歌选本盛极一时。甄选前代或当代的诗歌,甚或加以评说,这本身就是一种以积极主动的姿态介入文献传承的行为,而其成果便转化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文献。这些文献承载了当时人的诗学观念,承载了后人对前代诗歌文化的理解,记录了后人对再后人的影响痕迹,尽管其后来或存、或残、或佚,但通过对这些文献遗存的清理,我们观察南宋诗学之时,就可以占据一个更好的文献传承的视点。卞东波《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中重点考论的八种南宋诗选以及其他二十多种诗选,在这一方面的意义不容小觑。与前两种著作不同,孙立尧《宋代史论研究》则以史论文献的整理与阐述

为中心。“宋代是中国史学的颠峰,而史论正好契合了宋代的文学、史学、经学与理学等诸多学术问题。”史论据史事而发,集中体现当时人对历史的理解与利用;又依经立论,深受宋代理学思想的影响;作为一种论说文体,其文章又呈现出文学化的诸多趋向。夸大一点说,宋代史论是一种跨越经、史、子、集四部的文体,遗憾的是,以往学者对此类文献关注甚少。孙著不仅有对两宋史论发展的线性描述,对史论的文学化与理学化也有颇为深入的剖析,很值得一读。

这套丛书的作者和编者,目前都供职于南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和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多年以来,他们精诚合作,凝聚成了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这个集体的成员们坚持将文献学与文艺学相结合的学风,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特色。本丛书就是部分团队成员的集体展示。我们高兴地看到,在作者队伍中,既有寿逾耄耋而老当益壮的卞孝萱先生,也有年富力强的中年学人,还有年方而立的后起之秀。当然,读者们也不难看出,丛书中有少量成果是在课题开始之前完成的,这说明我们一贯的研究方向与这一课题旨趣不谋而合。整理典籍,阐释国故,发古典之新义,阐旧邦之新命,这是文献传承的核心内涵,也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也许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小说文献研究	3
第一节 中国小说文献学的酝酿与初创	3
第二节 先驱者的提倡与示范	12
第三节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小说文献的收藏与寻访	27
第四节 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	52
第二章 建国后三十年间的中国小说文献研究	69
第一节 建国后十七年间的中国小说文献研究	69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中国小说文献研究	85
第三章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小说文献研究	91
第一节 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恢复与新变	91
第二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	94
第四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文献研究	124
第一节 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成熟与新变	124
第二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主要成就	127
第五章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文献研究的不足与缺憾	164
第六章 二十世纪《三国演义》文献研究述略	168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三国演义》文献研究	168
第二节 建国后三十年间的《三国演义》文献研究	175
第三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国演义》文献研究	178
第四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三国演义》文献研究	186

第七章 二十世纪《水浒传》文献研究述略	195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水浒传》文献研究	195
第二节 建国后三十年间的《水浒传》文献研究	202
第三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水浒传》文献研究	211
第四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水浒传》文献研究	219
第八章 二十世纪《西游记》文献研究述略	223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西游记》文献研究	223
第二节 建国后三十年间的《西游记》文献研究	230
第三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西游记》文献研究	233
第四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西游记》文献研究	237
第九章 二十世纪《金瓶梅》文献研究述略	243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金瓶梅》文献研究	243
第二节 建国后三十年间的《金瓶梅》文献研究	247
第三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金瓶梅》文献研究	250
第四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金瓶梅》文献研究	259
第十章 二十世纪《聊斋志异》文献研究述略	268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聊斋志异》文献研究	268
第二节 建国后三十年间的《聊斋志异》文献研究	274
第三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聊斋志异》文献研究	281
第四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聊斋志异》文献研究	286
第十一章 二十世纪《儒林外史》文献研究述略	292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儒林外史》文献研究	292
第二节 建国后三十年间的《儒林外史》文献研究	294
第三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儒林外史》文献研究	298
第四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儒林外史》文献研究	302
第十二章 二十世纪《红楼梦》文献研究述略	307
第一节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红楼梦》文献研究	308
第二节 建国后十七年间的《红楼梦》文献研究	317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楼梦》文献研究	329

第四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红楼梦》文献研究	336
第五节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红楼梦》文献研究	351
第六节 《红楼梦》文献研究的不足和缺憾	365
参考文献	369
后记	372

绪 论

中国小说研究进入学术殿堂,并升格为一门具有现代学科性质的专学,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收获,也是中国现代学术区别于传统学术的特色与个性之所在。与诗文辞赋乃至同属通俗文学的戏曲相比,小说在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地位可谓最低,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作稗官野史、淫词邪说之类,不入大雅之堂,受到主流文化的歧视和排斥,处于自生自灭的无序状态,文献资料散失严重。在小说研究创建之初,由于缺乏必要和足够的学术积累,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与研究自然就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工作,受到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这正如一位学人所言:“夫一代学术之兴,往往有待于新材料之发现,地下古器物固无论矣,即图书之流传,亦显晦有时,其间或存或亡,实与学术升降有关。”^①小说研究近百年的历程也正好验证了这一观点。

经过历代学人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和良性积累,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可以称得上硕果累累,成就显著,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蔚然可观,自成一体,为小说研究构筑了一个十分坚实的学术文献平台。作为小说研究的基础工作,小说文献学的进展一直在广度和深度上深深影响着小说研究的其他分支,它不仅为后者提供了极为丰富、坚实的文献资源,同时也决定着整个小说研究的基本格局与走向,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密切关系。每次重要小说文献如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明刊本《金瓶梅词话》、甲戌本《石头记》等的新发现,都大大地将小说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反之,小说文献的缺乏也会对相关研究形成难以突破的约束和限制。

就小说文献自身而言,由于其产生、存在、传播的社会文化语境与诗文辞赋等文学样式有着很大的差异,虽然它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大体上也符合中国文献学的一般规律,但它更有许多自身独具的特点,这尤为值得

^①袁同礼《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序,1935年印行。

研究者深入探讨。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学界对此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事实是:尽管小说研究方面的论著数以千计,尽管研究者在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但至今还没有一部对小说文献学进行整体观照、系统阐述的专著问世,甚至就连专门探讨这一问题的研究论文也不是很常见,这一事实无疑让人感到尴尬。具体研究成果的厚实与理论分析层面的贫乏形成了一种极为鲜明的反差。也正是为此,小说文献学的研究有着现实感和紧迫性,这也是笔者近年来涉足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搜检翻阅,对二十世纪小说文献学的发展演进情况从宏观上进行一番认真仔细的梳理和归纳,然后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小说文献的各个方面及诸种特性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总结和分析,从中发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无论是对小说研究还是对中国文献学来说,相信都是比较有意义的,也是值得去做的。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社会文化环境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起伏涨落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面目迥异、宽严各别,这些变化对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包括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皆有着很大的影响,相关研究于不同历史时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据此,本书依据小说文献学在纵向时标上产生演进的自身特点,将其发展历程分成几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并结合中国小说研究的整体走向,按时序先后分别给予较为详尽的介绍和分析。对那些研究者探讨较为集中的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鉴于相关文献较为丰富,研究成果也比较多,本书则设立专章,进行较为全面、详细的介绍。

第一章 二十世纪上半期的 中国小说文献研究

从二十世纪之初至1949年,这是中国小说文献学的初创期。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文化处在极为剧烈的动荡和转变中。其间就学术研究而言,正经历着从传统学术到现代学术的脱胎换骨式的蜕变,小说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着中国现代学术的新变与特色。

正是在这一时期,受异域文化的巨大影响和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动,向来为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小说受到空前的重视,相关研究开始起步,走进大学课堂,被纳入现代学术谱系,最终得以成为一门为社会各界广泛认可的专学,正如鲁迅所描绘的:“小说和戏曲,中国向来是看作邪宗的,但一经西洋的‘文学概论’引为正宗,我们也就奉之为宝贝,《红楼梦》《西厢记》之类,在文学史上竟和《诗经》《离骚》并列了。”^①毫无疑问,这一时期无论是在中国小说研究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

第一节 中国小说文献学的酝酿与初创

根据小说文献学自身发展演进的特点,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界,可以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小说文献研究分为前后两个小的历史阶段。

从二十世纪之初到1917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这是中国小说文献学的酝酿期。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于西学东渐、困境反思的特殊文化语境中,经梁启超等先驱者的呼吁和提倡,中国文学的传统格局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其标志之一就是人们对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的认识发生了重要转变,其社会文化地位大大提升,从文学结构的边缘被推向核心,形成并奠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这一改变很快便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对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皆

^①鲁迅《徐懋庸〈打杂集〉序》,载《且介亭杂文二集》第6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尽管梁启超等人的观点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功利性,着眼点主要在改造国民、救亡图存等政治层面,而不在文学自身。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因为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它基本上解决了小说研究中研究对象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确立了小说在学术文化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基本前提下,才会有人立志将小说研究作为终身不缀的事业,才会有人愿意花大功夫进行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否则,连自己都看不起小说,把它当作不登大雅之堂、壮夫不为的小玩意儿,怎么会将其搬上大学课堂,又怎么会将其当作一门学问进行研究呢?可以说,对小说认知的转变,树立新的小说观念,这是小说研究成为一门专学、得到社会广泛认可的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步骤,这一步骤是由梁启超等人完成的。

自然,说小说研究在开创时期缺少必要和足够的学术积累,这是就先前的整体状况而言的,并不是说一点积累都没有。自明代以来,随着小说的繁荣和社会影响的增大,一些具有开明思想的文人开始关注这一领域,他们收藏、刊印了一些重要小说文献,撰写了一些评述性文字,有保存、传播小说文献之功。比如高儒的《百川书志》、晁琬的《宝文堂书目》、钱曾的《也是园书目》等私人藏书目录就著录了不少小说作品。清嘉庆、道光年间,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将宋本《梁公九谏》和《新刊宣和遗事》收入其《士礼居黄氏丛书》中影刻出版。不过,这些收藏和刊印更多的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重点在宋元旧本,并没有形成明确、自觉的学术意识。而且这些只是个人行为,不具普遍性,缺少社会共识,自然也就无法形成规模和体系。在此情况下,本来就不够丰富的小说文献无法得到系统、完整的保存,只能是自生自灭,散失严重。

进入二十世纪,在梁启超等先驱者的大力提倡和示范下,小说获得了较高的社会文化地位,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受这一时代文化风气的影响,小说文献的搜集、整理和刊印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有些学人开始注意搜求稀见的古代小说特别是宋元小说,将其刊印流传,或进行小说资料的搜集、小说目录的编制。这里择其较为重要者,进行简要的介绍:

一、稀见小说作品的整理和刊印

这一时期,有一些稀见的小说作品得到整理、刊印,虽然数量并不算多,但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开其后小说文献研究之先声。举其要者,有如下一些:

1911年,叶德辉刊刻《唐开元小说六种》,该书共收录《次柳氏旧

闻》、《杨太真外传》、《梅妃记》、《李林甫外传》、《高力士外传》、《安禄山事迹》等六种记述唐开元间逸闻掌故的小说作品。这些作品皆出自明顾元庆辑刻的《顾氏文房小说》，叶德辉“从长沙故家购得四十种全者”，他考虑到这些小说“脍炙人口，而世鲜善本”，于是精心校勘，“刻之以公诸天下”^①。书后附有叶德辉所写《考异》一卷，对作品中的异文进行考辨。

叶德辉刊印这些小说的目的和方式与以往的书坊有着明显的不同，非为牟利，态度也很认真，比如《次柳氏旧闻》一书的校勘“以明顾元庆《文房小说》为主，参以《五朝小说》、《明皇十七事》，于其异处，条举于后，即显然讹误，亦但校记以存其真”^②。

1915年，缪荃孙“避难沪上，索居无俚，闻亲串妆奁中有旧钞本书，类乎平话；假而得之”。读过之后，他认为这“的是影元人写本”，为“也是园中物”^③，遂将该书以《京本通俗小说》之名编入《烟画东堂小品》丛书刊印。该书刊印后，受到学界关注。尽管后来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这是一部伪书，但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被视作宋元话本小说的早期刊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同一年，罗振玉、王国维在日本三浦将军处发现《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小字本，王国维认为该书“与《五代平话》、《京本小说》及《宣和遗事》，体例略同。三卷之书，共分十七节，亦后世小说分章回之祖”，并感叹道：“今金人院本、元人杂剧皆佚；而南宋人所撰话本尚存，岂非人间希有之秘笈乎！”^④罗振玉亦有相同的看法和感叹：“平话一门，不知人间尚存残帙否？念之慨叹！”^⑤1916年，罗振玉将小字本影印出版。同年，罗振玉又从日本德富苏峰处借到另一版本即大字本的《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

①以上叶德辉《重刻唐人小传三种》序，载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第1821、18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叶德辉《重刻次柳氏旧闻》序，载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第1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③以上见江东老蟾《京本通俗小说》跋，文学古籍刊行社1987年影印版。江东老蟾即缪荃孙。

④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载李时人、蔡镜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55、56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⑤罗振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一），载李时人、蔡镜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57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话》，经比对，该书与小字本“称名虽异，而实是一书”^①，遂将其编入《吉石盦丛书》影印出版。该书的出版对研究宋元话本小说及《西游记》的成书具有重要意义。

1901年，曹元忠到杭州游玩，得到宋巾箱本《五代史平话》，“顾各家书目，皆未著录。博访通人，亦惊以为罕见秘籍”^②。1917年，著名藏书家董康将该书与《剪灯新话》、《剪灯余话》、《醉醒石》等四种小说收入其《诵芬室丛刊》中，精印刊布^③。其中《五代史平话》、《醉醒石》两书后还有缪荃孙所写的跋语，其中对小说功能的体认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大凡小说之作，可以见当时之制度焉，可以觐风俗之纯薄焉，可以见物价之低昂焉，可以见人心之诡谲焉。于此，演说果报，决断是非，挽几希之仁心，断无聊之妄念，场前巷底，妇孺皆知，不较九流为有益乎？况又笔墨之简洁，言语之灵活，又出于寻常小说者。”^④这也正可说明这一时期缪荃孙等人刊印上述小说的动机和初衷。

由上述介绍可以看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来，比如这一时期整理刊印的小说作品多较为稀见，其整理刊印者无论是叶德辉、缪荃孙，还是罗振玉、董康，都是当时十分有名的藏书家和版本学家，特别是董康，比较注意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文献的搜求。也正因为他们都是藏书家，才有机会搜罗到这些珍本秘籍，才会花费很大的精力进行影刻传布。他们刊印的小说皆十分精良，受到学界推重，成为新善本，比如胡适曾对董康刊印的小说、戏曲给予很高的评价：“董康先生翻刻的杂剧与小说，不但给我们添了重要史料，还让我们知道这些书在当日的版本真相。”^⑤

这些学人刊刻这些稀见小说的目的，固然是出于对珍本秘籍的喜爱，但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时代文化风尚的影响，比如董康对小说就有着这样的认识：“励学之方，径轨至繁，不宜囿于门户，以狭其途。由经史

① 罗振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二），载李时人、蔡镜浩校注《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校注》第57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② 曹元忠《五代史平话》跋，载《新编五代史平话》第249页，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③ 至于具体的刊刻情况，参见马幼垣《董康景印〈新编五代史平话〉的真相》一文，载其《实事与构想——中国小说史论释》，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7年版。

④ 缪荃孙《醉醒石》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⑤ 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载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卷第140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